

20 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经典研读丛书

魏本亚研读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丛书主编 魏本亚 陈黎明 时金芳
本册主编 魏本亚

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



20 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经典研读丛书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魏本亚研读

丛书主编 魏本亚 陈黎明 时金芳
本册主编 魏本亚

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

Weibenya Yandu Ruanzhen Zhongxue Guowen Jiaoxuef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本亚研读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魏本亚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7

(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经典研读丛书/魏本亚,陈黎明,时金芳主编)

ISBN 978-7-04-038334-8

I. ①魏… II. ①魏…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3478号

策划编辑 魏振水 责任编辑 房世佳

特约编辑 王跃平 封面设计 王 洋

版式设计 王 洋 责任校对 窦丽娜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 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1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334-00

本书对阮真《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以及研读性评点,使阮真“用科学主义改造语文教育的创新实践及其在中国语文教育上的历史地位”为广大语文教育学习者和研究者所知。又通过设计的“与学者对话”“我思故我言”等栏目,试图引起对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反思和研究。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学校语文教育专业本科生、语文教育硕士的教材或基础阅读材料,也可供中小学语文教师、语文教育研究者和语文教研人员研修使用。

学术顾问

顾黄初 李杏保 周庆元 倪文锦

丛书主编

魏本亚 陈黎明 时金芳

丛书编委

步 进 陈黎明 李明高 史成明

时金芳 魏本亚 魏振水 徐林祥

许 艳 尹逊才 周文叶 张立兵

一、“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经典研读丛书”是一个专著系列，选编了在20世纪产生过重要影响的13本著作，集成8部。

二、总序对所选的20世纪中国语文教育著作进行鸟瞰，以期给读者一个历史坐标，作为判断这些经典著作历史价值的参照。

三、研读经典，在实际辨认经典历史价值的同时，还要发掘经典的当代镜鉴作用，丛书的编者在每一卷的评析中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

四、丛书采用了评注方式。注释表现在四个方面：1. 对读者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作出必要的注释；2. 对生疏的词语作出注释；3. 对不同的表达方式作出注释；4. 对与当代表达不一致的地方作出注释。评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经典的重要观点；2. 经典涉及的重要词语；3. 经典涉及的研究方法；4. 经典涉及的研究过程；5. 经典涉及的数据；6. 对当下有现实指导价值的内容。

五、栏目设计包括“与学者对话”“我思故我言”。前者分为两种设计：首先，选择经典作者本人以及同时期其他专家的观点，以期让读者了解当时学界的观点、态度，以便作出判断。其次，选择当代学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以期让读者能够作出比较，进而作出判断。后者旨在调动读者的积极性，让读者参与其中，读者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后边，实现真正的对话。

六、附录设计。附录一为原作者的研究论著目录及文摘，尽可能全面地为读者提供一个论著的路线图，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文摘。附录二为后人研究论著及文摘，这一部分旨在说明对于经典研究的现状。附录旨在发掘最新的研究资料，以期给读者一些线索与启发。

七、经典的版本依据。以最初出版的著作为基础，参考其他版本进行校对。

八、尽可能保存经典的原貌。对于其中的异体字、异形词，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尽量保留。有的经典原版是竖排版，现在改为横排版。

九、标点符号改为现在通行的标点。

十、文中所引资料都注明出处，如作者、题名、杂志名、年月期，以及书名、出版社、出版年月。

十一、提供原作者的照片。

总 序

研读语文教育经典的历史价值 及对当代的启示

魏本亚 陈黎明 时金芳

所谓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作品或著作,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眸百年语文教育学科发展,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批语文教育巨匠用他们的智慧建造了一座座语文教育研究的丰碑。这些巨匠造就的语文教育经典在当时引领了中国的语文教育;在今天的语文课程改革进程中,这些著作历久弥新,重读这些经典,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2001年以来,我们多次向语文教育大家如朱绍禹、顾黄初、李杏保、饶杰腾、曹洪顺、周庆元、倪文锦等先生讨教,多次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历经10年,精选出大家公认的13本经典并将其集成为8部著作,加以批注评点,奉献给读者,以期与读者共同倾心研读,一起走近大师,承受经典之惠泽,为中国语文课程改革提供可资镜鉴的路标,为喜欢研究语文教育的同仁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史料,为中国语文学科建设作出应有之贡献。

一、审视语文教育经典的历史价值

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巨人,一个时代需要一个时代的精神领袖。语文教育需要巨匠的引领,而那些高瞻远瞩的学人恰恰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的巨匠。

(一) 学科独立呼唤构建语文教学体系

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成为一门举足轻重的学科。学科独立之初,读经的余威尚在,科举的影响尚存,本国语文学什么、怎么学,成了学科发展的瓶颈。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几位胆识过人的语文教育家站了出来,用他们的智慧探索引领了中国语文教育新的发展方向。

1. 黎锦熙张扬“主副目的”说

1919年新文化运动引进了“科学”与“民主”两位先生,唤醒了国人的自强意识。白话文终于冲破了文言的樊篱逐渐步入人们的生活,逐渐

进入国语文教学。言文统一成了时代的要求。白话文登堂入室进入教材。但是白话文学什么、怎么教，成了时代的难题。面对国语文的困境，语文教育家黎锦熙先生经过多年研究，于1924年奉献了《新著国语教学法》。他把时人陈天启等人倡导的“主副目的”说在他的专著中充分张扬。他认为：主目的是语文方面的，包括“理解”与“发表”；副目的是心意方面的，包括“智、德”两个方面。围绕主副目的，黎先生设计了“自动的研究与欣赏”“社交上的应用”“艺术上的建造”“个性与趣味的养成”四条路径。前三项是国语文教学的主要功能，这就凸显了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价值；但由于语文又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又应注意通过它养成“个性与趣味”，以求在锻炼人格上起到辅助作用。为此，黎先生首次提出语文教学要注意“能读、能听、能说、能作、能写”五个方面。黎先生借鉴“自动主义形式教段”，设计了“三步六段教学程序”，到《新国文教学法》中又简化为“四步教学”法。黎锦熙先生在《新国文教学法》中明确提出了语文教学四种基本训练方式：“话法”（说话），“故说话一项，实已为本国语文教学之中心”；“读法”，预习、整理、总结深究或练习、发展与应用；“作法”（作文、写作），“事理直切”“下笔迅速”“文法正确”；“书法”（写字、习字），循序渐进，臻与成熟。

《新著国语教学法》是国语文学科第一部理论著作，该著作厘清了学科性质、学科教学任务、学科教学基本方法，这为引领当时的语文教育实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国文教学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语文教学论理论著作，它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又有新突破。故而这两部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两个时期的开山之作。

2. 王森然主张人格“训练与修养”

1923年的“新学制”给国语文带来了些许春意，但是旧体制的春寒依然未退。学制新了，教材新了，先生们的施教仍然“新瓶装旧酒”。王森然认为“现在的中学国文教育，糟，是糟透了”。审视学科独立之后的

20余年国语文教育，梁启超先生提出了“六难说”：（1）没有明确的标准；（2）进步、退步难分，新的旧的难辨；（3）党派分别最杂，偏狭见解至今未尽；（4）范围太隘，而分类太广，难以把握；（5）对国文的概念界说不明，国文和国学的界限不清；（6）材料太富，难选适合教学的教科书。有鉴于此，王森然从国语文实践出发，提出“因为人类一切知识经验的供给，全靠语言文字的传达，因此，如个人情绪与情操的培育，意志的建设与锻炼，信仰的基础，总之人格训练与修养不能不有赖于此；而艺术生活的陶冶，如欣赏的增高，创作的引诱，人类精神欲趋向于‘真’‘善’‘美’之途，更不能不以是为发轫之地”。围绕人格的“训练与修养”，王森然将全书分为六大板块：（1）绪论。包括国文在教学上的价值、国文教师的责任、国文教学的主张。（2）目的与课程。包括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中学国文教学的课程、课目纲要的说明。（3）教学与材料。包括中学国文教材的选择、中学国文选材的方法、中学国文教材排列、中学国文教材与学级的编制。（4）教学与方法。包括教学方法的讨论、教师和学生应特别注意之点、学生学习问题、讲读的程序及考查成绩、中学语体文教学法纲要、中学文言文教学法纲要。（5）作文与试验。包括中学作文的教学、中学作文教学的琐识（上）、中学作文教学的琐识（下）、中学作文教学的程序、中学国文试验的方法。（6）结论（附录）。作者从课程、教材、教法三个维度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这在当时是独领风骚的。针对当时国语文学习价值的困惑，王森然先生从社会学视角提出国文教学“四价值论”：个人方面，是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是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社会方面，是社会生活巩固的需要，是社会生命永久的需要；国家方面，是国家组织的需要，是国家存在的需要；世界方面，是促进世界联合的需要，是完成世界创造的需要。这在当时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3. 阮真力主用科学精神与方法推进语文教育研究

阮真是一位接受过科学训练的学者。1919年前后，阮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接受了陶行知等学者的科学训练。1929年，阮真受中山大学庄泽宣教授的邀请赴中山大学任教，深受庄泽宣等学者的影响。他不尚空谈，总是亲临实践，用事实说话。1930年前后，他带领教育研究所的学生深入广州等地的中小学，实地调查当时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写出了《中学作文教学研究》《中学国文校外阅读研究》《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研究》《中学读文教学研究》四部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著作。1936年，他又应东南大学教务长汪懋祖教授邀请为正中书局撰写了《中学国文教学法》。作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国语文，为语文教育研究趟出了一条新路，这部著作也成为里程碑式的经典。

“作者立论，最重逻辑。条分缕析，颇有系统。凡所言者，最切实际。自谓所贡献于今日之中学国文教学者，不无精到之见地与实际之指示。虽尝博览各家之说，而不肯贸贸然采取之。故恒有严格之批判。”基于此，作者总是亲临实践、面向实际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他提出初高中国语文教学目的应该是“层递式”的，总目标之下要有具体的分解目标，这样便于不同年级操作。他通过调查证明当时的教师生存状况极其可悲，提出社会应该为语文教师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他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构建了具有科学特征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这种借助科学手段研究语文获得的结论就具有了科学的价值，为学科真正独立与发展奠定了相当重要的理论基础。

4. 蒋伯潜明确语文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

1940年前后，新学制已实施近20年，中国的语文教育依然不尽如人意。每年的中考、高考过后，社会上总要口诛笔伐，语文教育每况愈下，学生一代不如一代。面对社会上的种种非议，蒋伯潜先生用他的力作《中学国文教学法》作出了回应。蒋伯潜先生指出：“如果希望提高一般中学

生国文程度水准，不得不在国文教学的本身想着；教学的目的，教师的素养，课内讲读的教材和教法，习作的指导和批改，各种课外工作的指导，教师的进修……都应当平心静气地，逐一加以检讨，以求改进！”

在讲读教学方面，作者提出：讲读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应坚持确当的选材标准与组材形式；应有一定的步骤；应注重课后的督促与检查。在作文教学方面，作者提出：作文命题要以学生为中心；作文指导应抓一般的指导与特殊的指导两个方面；作文批改可以采用学生自改和黑板练习两种方式。在课外指导方面，作者提出：要做好对学生课外自由阅读的指导；要做好对学生课外作业的指导；要做好对学生课外习字的指导；要做好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这三个方面是语文教学的重点所在，蒋伯潜先生都把学生置于语文学习中心，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5. 艾伟为语文教育打开心理学探究的窗户

艾伟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西方心理学教育的专家。他用 20 年的时间到中小学实验、调查，即使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有中断。1948 年、1949 年他奉献给读者的《国语问题》《汉字问题》，为语文教育打开了一扇心理学研究的窗户。关于国语，作者指出：“著者对于小学国语阅读心理之探讨，二十余年于兹矣。其目的在求教育之科学化。教育科学化之含义，卑之无甚高论，即实事求是之谓也。从事教育事业者无论在行政上或教学上必须实事求是。”关于汉字，作者认为：“所谓科学之整理不外乎实事求是，盖初学者对于汉字之感觉有难有易。何种字易于学习？何种字难于学习？从教学经验中固可探知一二，然而欲窥全豹必须用实验方法作大量初学者之心理观察，并须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如是则症结所在不难查出，改进之道方能求得。”经过调查，艾伟认为常用汉字 2 400 个，11 画以下的字 1 200 个，11 画以上的字 1 200 个。识字教学面临三个问题：字形方面，笔画繁难的、笔画相近不利于学生学习；字

声方面，偏旁之误读，因字形而误读，因习惯而误读；字义方面，形旁变化引起误解，字形变化引起误解，联想错误引起误解，生僻字引起误解，字形难认引起误解。面对阅读教学问题、汉字教学问题，艾伟先生都提出了具体、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这些策略立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故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阅读教学科学、有效的呼唤与实践

阅读教学是国语文教学的难点与重点。中国古代的阅读教学注重积累，科举考试兴起之后，“四书”“五经”成为考试的对象。学子们死记硬背，就是为了“暮登天子堂”。读书、背书成了学子们的日常功课。学校兴起之后，学生学习的科目多了，所阅读的内容多了，阅读教学如何才能更有效，这也就成了语文教学的难点。对此，叶圣陶、朱自清、袁哲、艾伟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故而他们的研究著作也就成了阅读教学的经典。

1. 袁哲首倡“全文法”提高阅读效率

袁哲是一位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学者；他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师从当时著名教育家稻毛诘风研究教育。1936年，袁哲撰写并出版了《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为语文教育研究又推开了一扇窗户。袁哲借助西方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的阅读教学，为当时的语文界提供了新鲜的教育经验。袁哲指出：“读法教学理论之研究，既如此漠视，则实际读法教学方法之幼稚，亦可想见矣。夫读法教学为小学教育中之重要部分，读法教学之优劣，直接影响全部小学教育效率之大小；儿童读法成绩之低劣者，亦难望其各科有优良之成绩。故欲图小学教育效率之增进，必须改进读法科之教学，而欲改进读法科之实际教学，必须有读法之科学理论以为根据，此所以读法教学之理论，为从事或研究小学教育者，所必须明了也。”

鉴于此，袁哲提出：“读法教学者，乃系根据一定之目的与目标，循最经济之途径，使儿童对于理解文章之意义内容乃至生命等之内在的事物，

及理会其表现形式（包含文字、语言、文章）的能力，能继续改进发展的‘感与应之循环往复的作用’也。”这种教学要关注两个方面：其一，要先全体的概览，而后局部的分析；先内容的吸取，而后形式的探究；先理解而后记忆。其二，要多方的补助想象，并随机设计表演，把内容情景，显露无遗，使儿童得以充分的欣赏。垣内松三指出：“读法教学之方法，有两种潮流：一种是经验的立场，一种是观念的立场。从教育之事实上说起来，一种是客观的，一种是主观的，两者都不是全面的能够完成读法教学之目的。袁氏涉及此两方面，从历史上理论上，检讨东洋欧美之学说与实际，且发扬其理论，而在此提倡‘全文法’，确可谓读法研究上之合理的统一。”袁哲的此项研究不仅带来了外域的经验，而且解决了语文教学中的问题，故此书成为时代经典。

2. 叶圣陶、朱自清首倡“精读”“略读”提高阅读效度

阅读教学难教，效果不好是一大痼疾，大家对它束手无策。关于文言文，老师们认为可以发掘其“微言大义”，有东西可讲；关于白话文，老师们则认为无法下手，因此就放任自流。阅读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叶圣陶、朱自清两位语文教育家高瞻远瞩，于1941年、1943年奉献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提出了“精读”与“略读”两种阅读教学范式，为提高阅读教学效率辟出一条坦途。

作者认为：一篇文字，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文字后面的时代背景，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客观上的缺点与疵病，这些就是所谓的不同的观点。对于每一个观点都可以提出问题，令学生在预习的时候寻求解答。如果学生能够解答得大致不错，那就真个做到了“精读”两字了——“精读”的“读”字原不是仅指“吟诵”与“宣读”而言的。精读有精读的作用，略读有略读的价值。“学生从精读方面得到种种经验，应用这些经验，自己去读长篇巨著以及他的单篇短什，不再需要教师的详细指导，这便是‘略读’。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

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在《略读指导举隅》中，叶圣陶、朱自清列举了当时教材中的名篇——讲解，为当时处于迷茫之中的国文教师提供了范例。

（三）作文教学科学、有效的多方位探索与总结

作文教学历来就是语文教学的难题，投入时间多，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科举取士，举子们只要学会让人似懂非懂的八股就可以了；学校教育，学生们却要为了生活着想，学习与生活相关的写作。旧时代的先生们依然用老办法教新学生，方法还是老的，思想还是旧的，写的内容却是新的。旧瓶装新酒自然装不出什么新花样，作文教学也就为社会所诟病。语文界的有识之士力主用新思想、新方法改造当时的作文教学，以期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1. 梁启超把脉作文教学

梁启超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为作文教学把脉，切中作文教学的弊端。他认为，要提高作文的效率就要让学生写出真实的内容抒发真实的感情。他认为，文章的作用在于有思想，有思想则在于“有内容”“有系统”。有了思想还要让别人理解接受，那就需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表自己想达的意”。关于文体他提出“记述之文”和“论辨之文”两种，两种之下又分为若干细目，如记述之文就可以分为记“静态”的和记“动态”的两类，每一类都有不同的要求。梁先生提出了五种观察方法：鸟瞰法，跳出来站在高处看事物；类括法，即观察法，亲历实地观察；移步法，移步换形看事物；凸聚法，即陪衬法；商尝法，即集中一点的写法。梁先生深入浅出，把深奥的道理讲得通透易解。谈到论辨之文，梁先生将其归为五种：说喻、倡导、考证、批评、对辨。说喻之文是对于特定的一个人，或一部分人，发表自己意思，劝他服从某道理，或做某件事。倡导之文是标举一种政策或一种学术，树堂堂正正之旗，对于全国人（非特定人）或全世界人，乃至将来之人，发表意见。考证之文在于列举

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批评之文在于借助事实批评人家。对辨之文，是答人家的批评。梁先生每讲一类都引经据典，深入浅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时至今日，捧读梁先生的巨作，我们仍有醍醐灌顶之感。当人们还在孜孜探索什么观察法、论证法的时候，捧读梁先生著作我们才感到我们的浅薄！

2. 陈望道关注生活写作

陈望道是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卓越的语文教育家。他在1922年发表的《作文法讲义》是一部早期研究作文教学的力作。他认为：“文章是一种传达意思的工具。我们传达意思，惯常共有三种凭借：第一，是动作，就是招手、摇头等态势；第二，是声音，就是所谓自言、答难的语言；第三，是衍形、衍音的文字。用文字传达意思的制作，就是文章。”“文章必由意思和文字两个原素融合而成，减少不得，更换不得。减少了文字这原素，必只是纯粹的心理现象，更换了文字这原素，也必成了上文所述的态势或语言，不会依然是文章。减少了意思这原素，结果也是如此；我们或可以称彼为一种游戏的排列，却不能称彼为文章。”他在著作中提出时下作文教学存在两种现象：“技术主义”与“情绪主义”。前者的缺点在乎刻意雕琢事象，后者的缺点在乎任情曲解事象。缺点虽然不同，结果却是一样：毁伤真实。我们要写作“力求真实”的文章，就需要关注生活。陈先生从不同类型的文体要求论述了具体的要求，从字词句章到谋篇布局都体现了大家风范，给读者以切实的帮助。

3. 夏丏尊、刘薰宇强调作文是表情达意的工具

1926年，夏丏尊、刘薰宇出版《文章作法》，一时间洛阳纸贵。夏丏尊、刘薰宇认为：“文章本是为了传达自己底意思或情感而作的，所以只是一种工具。单有思想或情感，没有用文字发表出来，就只能保藏在自己底心里，别人无从得知。单有文字而无思想或情感，不过是文字底排列，也不能使读的人得到点什么。思想或情感是文章底内容，文字底结构是文章底

形式。内容是否充实，这关系作者底经验、智力、修养。至于形式底美丑，那便是一种技术。严格地说，这两方面虽是同样地没有成法可依赖，但后者毕竟有些基本方法可以遵照，作文法就是讲明这些方法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阐述了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的写法。作者强调：“所谓好文章，就是达意表情，使读者读了以后能明了作者底本意，感到作者底心情的文章。应当怎样作法才能达到这种地步，这个问题包含很广，实不容易的；但综合起来，最要紧的基本条件，却有两个：（1）真实；（2）明确。”全书围绕如何能够有效地表情达意展开论述，凸显了实践的指导价值。

二、语文教育经典对当代的启示

上述语文教学法著作已出版发行多年，但是这些著作却历久弥新，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当代的语文教育也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时下语文教育争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在“重复别人的故事”，一些历史上就已有很好结论的问题人们还在争论，这种无知者无畏的举动着实可以休矣！研读经典，反思过去，正视现实，也许我们能够少走弯路，多一点有价值的探索。

1. 思想解放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基础

在百年语文教育发展中，我们国家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戊戌变法”运动。这次运动是从1896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的，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理念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要图强，就要变法，就要解放思想。“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加速了“科举制度”崩溃，加速了封建书院、私塾教育崩溃，加速了学校教育的兴起，加速了语文学科的独立。第二次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成了改造社会的利器，语文教育引进了西方的学制并逐步建立了适合学科特点的课程体系，语文教育逐

步走向成熟。第三次是 1978 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次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语文教育 30 年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大繁荣。

2. 创新是语文教育发展的动力

中国语文人从来就没有忘记创新，我们的前辈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语文教育的辉煌。1925 年，张震南等人在扬州中学改革国文教学，开设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课程。1935 年，夏丏尊、叶圣陶的《国文百八课》首次使用了单元编排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文选、文话、文法与修辞协调问题，开辟了语文教材编写新天地。1946 年，于在春在南通中学进行集体作文实验，较好地解决了学生作文低效的问题。1958 年，辽宁北关实验学校“集中识字实验”，既解决了汉字难学的难题，还解决了识字与阅读之间的矛盾。创新是中国语文发展的动力，虽然这种创新太少了，故而原创式的中国语文教育经验就更加可贵。

3. 引进与消化可以促进语文教育发展

语文教育从独立设科之日起就不断地接受外来经验，不断地受到外国教育理论的影响。1904 年学科独立，我们学习日本经验，翻译日本的教育理论，请日本人帮助我们编写教科书。但是我们没有照搬，我们采取了改造。1919 年，我们引进了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杜威的教育思想被普遍应用到中国的教育之中。此后 30 年间我们的语文人不断地改造、不断地吸收，美国的理论变成了中国的教育实践。1920 年，廖世承、舒新城引进了美国的“道尔顿制”，历时 10 年，涉及 100 多所学校，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他们发现文科实验结果不佳时便主动宣告中止实验。1956 年我们引进了苏联的“汉语”“文学”分科教学，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 3 年之后就因为种种原因停止了。1982 年，我们引进了美国的“目标教学”，全国 23 个省闻风而动，10 年之后，目标教学停止了。1985 年我们引进了美国的标准化考试，10 年之后标准化考试也停止了。